

## 第五章 高景逸實學思想的體現

從上章高景逸工夫論的探究中，不難發現其所關注的焦點不僅在於思想理論的建構，且更看重其思想理論具體實踐於現實生活的進程。曾言：「每至夕陽，檢點一日所為，若不切實鍛鍊，身心便虛度。流光如駛，良可驚懼。」<sup>1</sup>足見景逸認為要切切實實地於日常生活中體現，實為生命中最為切實的工作。

高景逸實學思想的體現，可從其以「躬行實踐」為教法，以及講學、議政的緊密結合這兩方面來論說。

### 第一節 以「躬行實踐」為教法

前文論及高景逸說解《大學》中格物之義時，將格物之義與修身結合，必須收攝於身心，此即所謂「知本」。由此看來，這樣的理論架構，一方面能矯治當時王學末流之弊；另一方面又可避免格物流向支離的毛病，這是景逸論定《大學》主要思想。而此思想從表面上看來，雖確實是為了修正當時任心肆意的學風，但論至善的「天理」於己於物、於內於外皆有事在的觀點，已經在無形中含藏了促使道德實踐由自身推廣至外在事物上。景逸言：

學問必須躬行實踐，方有益。如某人見地最好，與之言亦

---

<sup>1</sup> 高景逸：〈語〉，《高子遺書》，收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，1983年）卷1，頁342。

相入，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。是以知虛見無益。<sup>2</sup>

學問並無別法，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，體貼得上身來。雖是聖賢之言行，即我之言行矣。……故學問不貴空談，而貴實行也。<sup>3</sup>

景逸強調學問當躬行實踐，否則只是無益於世事的虛言而已。學問只有在躬行實踐的同時，才能將所學所知加以發揮。透過躬行實踐與學問相結合，學以致用，才不致於流於無益。這是景逸在心性論為基礎上所提出問學的目標，即實學思想的體現。

## 一、 倡議治天下以教化為先

景逸言：

臣惟自古治天下者，未有不以教化為先務。而教化之汙隆，則學術之邪正所係非小也。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，使天下曉然知所趨，截然有所守，而後上無異教，下無異習，道德可一，風俗可同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。<sup>4</sup>

高景逸認為教化是治天下的根本，同時也是端正學風的主要力量。從這個角度出發，景逸為其實學思想具體落實的第一步，便是對教化提出建言。首先，他認為明代之所以能上下維持長久，在於「祖宗教育之明驗」。其次，又指出後來教育逐漸走向空疏，虛幻言談之學盛行，學子「幼而讀之，老而不知一言為可

<sup>2</sup> 高景逸：〈會語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5，頁415。

<sup>3</sup> 高景逸：〈會語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5，頁421。

<sup>4</sup> 高景逸：〈崇正學闢異說疏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7，頁440。

用者固多」<sup>5</sup>，致使「本朝持衡國是者，無決斷之勇；分猷庶職者，有模稜之風。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，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」<sup>6</sup>。尖銳指出了晚明由於學風虛浮，教育不實，難以培養出「真才實學之士」，而且使一些人養成「模稜之風」，投「近世之好」，每每墮入「鄉愿」惡習。「鄉愿」之人，往往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，爲了自己的私心，「逢著忤時抗俗的事，便不肯做。不是畏禍，便怕損名，其心總是一團私意耳」。這種私心的結果，往往便與閹黨腐朽勢力同流合污，反沾沾自喜，認爲乃「明哲保身」。而這種無節氣、少廉恥的人，往往是「名利兼收，便宜受用」<sup>7</sup>。高景逸認爲這都是肇因於教化的問題，曾言：「何以使天下治？曰，人才。何以育才？曰，庠序之教。」<sup>8</sup>他認爲「政事本于人才，捨人才而言政者，必無政」<sup>9</sup>。而景逸更撰寫〈破用人格疏〉一文以澄清吏治以革新朝政，重新定位上下尊卑的倫理觀念。關於人才的選拔和錄用，除了改革科舉制度和「破格用人」之外，景逸認爲最根本的解決途徑，還是在教化的改革，才能培養「真才實學」之士。

## 二、 強調問學以通百姓日用

東林書院講學的宗旨之一，即對於迂闊而不切實際的事理及講、行分離的情形予以排除與導正。換言之，追求有益於人民生

<sup>5</sup> 高景逸：〈崇正學辟異端疏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7，頁441。

<sup>6</sup> 高景逸：〈崇正學辟異端疏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7，頁442。

<sup>7</sup> 黃宗羲：〈東林學案三〉，《明儒學案》（台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84年8月臺4版）卷60。

<sup>8</sup> 高景逸：〈無錫縣學筆記序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9上，頁556。

<sup>9</sup> 高景逸：〈語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1，頁344。

活之學，結合實際事物之學，才是其真正目標。身為東林書院領導者之一的景逸言曰：

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，此士大夫實念也。居廟堂之上，無事不為吾君，處江湖之遠，隨事必為吾民，此士大夫實事也。實念實事，在天地間，凋三光，敝萬物而常存。其不然者，以百初易盡之身，而役役於過眼即無之事，其亦大愚也哉！<sup>10</sup>

君子之所作所為，直要通得天下人才行得。……不能通天下而欲行一己之獨見，不要說天下人不從，即同志中也不從。<sup>11</sup>

《大學》之道，先致知格物，後必歸結于治國平天下，不能單靠言語說得何用。<sup>12</sup>

無用，便是落空學問。<sup>13</sup>

聖人之道不可見，見之於日用常行。<sup>14</sup>

侍先生三日側聞所論，庶幾不逆於心。歸而益博求之，見從古聖賢所傳之要隱約皆在於是日用之間。<sup>15</sup>

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，便不是學問。<sup>16</sup>

<sup>10</sup> 高景逸：〈答朱平涵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8上，頁486。

<sup>11</sup> 清·高廷珍輯：〈會語三〉，《東林書院志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68年）卷之5。

<sup>12</sup> 清·高廷珍輯：〈會語三〉，《東林書院志》卷之5。

<sup>13</sup> 清·高廷珍輯：〈會語三〉，《東林書院志》卷之5。

<sup>14</sup> 高景逸：〈答涇陽論猶龍一語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8上，頁471。

<sup>15</sup> 高景逸：〈與李見羅先生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8上，頁465。

<sup>16</sup> 高景逸：〈會語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5，頁411。

無論是在朝或在野，無論是君或是民，都是士人應該關心的對象，此一概念顯然是傳承了儒家對士人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觀念。為學的目的，即在於救世，因此，引文中所謂的「通天下」、通「百姓日用」，均是再三的強調了結合實際社會生活日用的精神。不僅《大學》歸結於治國平天下，舉凡古聖賢所留傳下來的精義，同樣都必須能於日用間闡發，這是景逸衡量學問「有用」或「無用」的標準。當然，這也就從根本上矯正了陽明末流脫離實事實物的缺點，使學風轉向「經世致用」的風潮，亦由此展開。

此外，景逸並強調為學過程中透過朋友的聚會講習，亦有助於實事聞見，言：

存心必由靜坐而入，窮理由讀書而入，靜坐、讀書必由朋友講習而入。從事於斯，其益無方。<sup>17</sup>

凡會之正格，是學者煅鍊之大火候也。吾人終日孤居獨處，雖云學問，未經煅鍊，臨此大會方血戰。是時大家俱有一箇收斂貼身意思，其中或有所疑，各呈所見，商量印證，方有益也。不然，會時單講幾章書義，只是故事而已。雖有所聞，亦不過長得些聞見，還不是會之正格。<sup>18</sup>

景逸心目中理想的問學方式，除了自身的讀書、靜坐之外，還包括學者之間彼此切磋修身工夫的心得交流，而非只是個人的論談陳述。換言之，在專就書本知識，「各呈所見」之餘，仍須「商量印證」。學問須經過「煅鍊」而成，若「孤居獨處」，恐難有所成就。所謂「正格」即是透過彼此對話的方式，以印證事理，即

<sup>17</sup> 高景逸：〈書扇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12，頁718。

<sup>18</sup> 清·高廷珍輯：〈會語四〉，《東林書院志》卷之6。

學術之交流。「單講幾音書義」，只是「長得些聞見」，卻無法達到「以友輔仁」的境界。景逸心目中的「會之正格」，即藉由學者之間彼此的論辯，而尋求真理與共識。

再者，景逸認為透過問學的過程，亦可厚植氣節，其言：

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；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。若學問不氣節，這一種人，為世教之害不淺。<sup>19</sup>

陳福濱先生認為，高景逸從容就義，正是其氣節的表現。<sup>20</sup>而亦為實踐、致用的具體生命體現。景逸於明天啓元年二月，受魏忠賢等人以貪贓罪誣陷，在遭逮捕前即投湖而死。在其所留〈遺疏〉中言：「臣雖削奪，舊為大臣，大臣受辱，則辱國，謹北向叩頭，從屈平之遺則，君恩未報，結願來生」<sup>21</sup>之語，表現追隨屈原，以身殉國的崇高精神。<sup>22</sup>

## 第二節 講學與議政的結合

陽明心學發展到末流，說空說玄的風氣盛行，知識分子不聞國事，輕視現實生活中禮教法度，對於社會政治的影響頗大。眼見當時知識分子的墮落，由顧涇陽、高景逸所領導的東林學派便透過書院，企圖扭轉此一現象。在學術思想上，反駁王學末流種

<sup>19</sup> 高景逸：〈會語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5，頁420。

<sup>20</sup> 陳福濱：《晚明理學思想通論》（台北：環球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154。

<sup>21</sup> 高景逸：〈遺疏〉，《高子遺書》卷7，頁460。

<sup>22</sup> 關於高景逸生平，可參考步近智、張安青：《顧憲成高攀龍評傳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58-87。

種悖離傳統儒學的主張；在政治上，受到儒家的政治使命感驅使，藉由議政的方式以期改變執政者的決策方向，形成了講學與議政結合的現象。顧涇陽在為東林書院題寫的對聯中，言「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」，即已將講學、議政相結合之精神表達無遺了。

高景逸曾言書院講會的內容：

或細繹往古，或參酌來今，或研究典故，或詢訪人物。<sup>23</sup>

由此可知講會的內容不僅在於學理思想，事實上，同時也結合了社會現實問題，將講與習結合，一為言，一為行，意即學術與社會現實結合，二者不偏廢，而使講會不至於脫離現實而流於空談。這是東林學派所開創的嶄新講學風氣。

黃宗羲於《明儒學案》中記載東林書院重建初成的情形時，載曰：

甲辰，東林書院成，大會四方之士，一依白鹿洞規。其他聞風而起者，毗陵有經正堂，金沙有志矩堂，荊溪有明道書院，虞山有文學書院，皆捧珠盤，請先生之蒞焉。先生（按：顧涇陽）論學，與世為體，嘗言：「官輦轂，念頭不在君父上；官封疆，念頭不在百姓上；至於水間林下，三三兩兩，相與講求性命，切磨德義，念頭不在世道上。即有他美，君子不齒也。」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、訾議國政，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。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，廟堂亦有畏忌。<sup>24</sup>

<sup>23</sup> 清·高廷珍輯：〈景逸高先生行狀〉，《東林書院志》卷之6。

<sup>24</sup> 黃宗羲：〈東林學案一·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〉，《明儒學案》（台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84年8

顧涇陽將明初以來的書院講學重點，由「相與講求性命，切磨德義」的內聖思維，轉向「與世為體」，顯見其經、務實的企圖。東林學派「裁量人物、訾議國政」的講學方式，以及他們含藏在講學內容中的「冀執政者聞而藥之」的政治意圖，顯示純粹講求天理性命的修身成聖內容，再也無法滿足他們的思維視野。藉由書院與講學，將學術發展的趨向偏向內聖之學扭轉為外王的方向。顧、高等人，不僅僅由理學內部啓動時代思維的流轉，更將書院的功能與講學的內容方面更進一步擴大，由純粹的理學心性議題探討，向儒學的清議傳統復歸。

東林書院帶動書院講學的議政風潮，喚起了儒家政治理想主義的外王精神。東林書院建成之後，鄰近的毗陵經正堂書院、金沙志矩堂書院、荆溪明道書院、虞山文學書院等，都紛紛起而附合這樣一種結合講學與議政的方式，由無錫擴散，影響了相近的幾個書院聲氣一致的風氣，也使得自宋代以來學術思想的內聖修身之學的個人主義基調，一變為經世致用的風潮。

《明儒學案》對於包含景逸在內的東林儒者，在義理思想及議政上的表現，進而突顯出士人氣節丹心，評曰：

熹宗之時，龜鼎將移，其以血肉撐拒，沒虞淵而取墜日者，東林也；毅宗之變，攀龍髯而募螻蟻者，屬之東林乎？屬之攻東林者乎？數十年來，勇者燔妻子、弱者埋土室。忠義之盛度越前代，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。一堂師友，冷風熱血，洗滌乾坤，無智之徒，竊竊然從而議之，可悲也

夫。<sup>25</sup>

黃宗羲目睹了明代末年宦官亂政，經歷亡國之痛，而為東林的忠節提出了見證。東林學派紹承聖賢之傳統，不僅以言論、以講學、以政事，更以自家性命戮力以赴。從性理諸說到實行的工夫，他們揉和了儒家的學與行並重的精神，出之以道統的意識，為世道家國的苦心，終之以節義的表現。東林書院「一堂師友」的講學活動，也刺激了士子由不講實用的「空言之弊」，開啓了講學與議政結合的風潮。

---

<sup>25</sup> 黃宗羲：〈東林學案一〉，《明儒學案》卷 58。